

供 审 核 用
請 勿 外 傳

党在湖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

第 五 分 册

(抗日战争时期)

湖北省革命史资料编写小组编

1961.

目

第一章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創立和发展

(1937年7月—1940年12月) 1

第一节 湖北党組織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

蓬勃发展 1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地区各阶级阶层的动态 1

(二) 党在湖北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3

(三) 湖北省委的成立。党組織的恢复和发展 9

(四)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14

第二节 抗战初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在湖北 16

第三节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創立和发展 20

(一) 武汉淪陷。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20

(二) 新四軍南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 25

(三) 鄂豫边区党委的成立。根据地的創立和发展 30

第二章 鄂豫边根据地的巩固。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1941年1月—1942年12月) 37

第一节 新五师的建立。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37

(一) 新五师的建立和地方武装的发展 37

(二)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湖北地区的被粉碎 43

(三) 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46

第二节 鄂豫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和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 55

(一) 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及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55

(二)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設 61

(三)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 69

第三节 党組織的扩大和整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76

- (一) 党組織的扩大和整风运动的开展.....76
- (二) 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87

第三章 党领导湖北人民为爭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3年1月—1945年9月).....94

第一节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94

- (一) 新五师进军江南，鄂东南根据地的开辟.....94
- (二) 党领导边区军民粉碎湖北地区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反顽斗争的胜利.....99
- (三) 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03

第二节 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鄂豫边军民全面反攻。抗日战争的胜利109

- (一) 鄂豫边根据地人民繼續粉碎日伪“清乡”、“扫荡”和国民党的进攻109
- (二) 边区党大力組織群众、整訓部队，以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115
- (三) 抗日战争的偉大胜利在湖北119

第一章 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 創立和发展

(1937年7月—1940年12月)

第一节 湖北党組織的恢复和发展，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地区各阶级阶层的动态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这民族危亡关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湖北地区和全国形势一样起了极大的变化。湖北地区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主力红军撤离了苏区，国民党反动派捲土重来，重新压迫统治着人民，在经济上人民遭受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等重重剥削，加之连年水祸旱灾，土匪之横行，人民生活又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在政治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土豪劣绅到处横行，保甲制度更是黑暗腐化，敲詐勒索。人民群众遭受到极大的痛苦。

然而人民因为过去受红军共产党在这一个地区影响之巨大，有的地方系贺龙、徐向前行动之区域，有的地方经过长期

斗争的历史，我们的种子曾经散布在各个县份的中间。国共合作，激动了这些地区人民活动的心。

再加以日寇的加紧进攻中国，民族的危亡到了这么样严重的程度，许多人民都希望能够积极的起来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恢复他们过去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

不过由于地区与阶层的不同，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印象也不一致，一般的在农村中的贫农对党和红军的印象是好的，他们了解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而斗争的政党和队伍，……赤色群众是倾向和拥护我们的，一部分热情青年，目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积极要求抗日。……过去消极或叛变的分子，今天为了抗敌救亡，又怀着投机心理，参加救亡运动，有些……小资产阶级对国共合作表示畏惧，不敢参加救亡工作，挑拨离间的宣传在他们中起了很大影响。也有的人对党是无所谓的态度，对自己的苦痛深感不满，自己没有出路，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使他们深深考虑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

很明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国土后，民族已处于存亡的关头，广大人民群众是积极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也有些人是动摇不定的。而在地主阶级和国民党集团中，对待抗日战争开始时却存有两种不同态度。

在这些人物中间，有的比较开明，自从和平谈判以来，没有破坏团结的言论与行动，在南京失守的前后，他们曾主张打游击战争，从他们的一般行动看来，是主张和拥护抗日的，不过他们是有其立场和政治企图的。但在这些人中间，也有些顽固的死硬派，如黄冈县长余希纯等，一贯压迫救亡运动，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很坏，有时候甚至在公开言论上反对共产党。

各县的政治机构，相当的腐败，特别是代表政府下层政治机构的保甲制度，更是黑暗腐化，各县政治机构充满了复兴与CC的人物，……各县的绅士势力也很大，有的简直可以左右地方行政。

以上总的說来，党在湖北有着深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共产党而积极参加抗日的。但是由于存在着一些頑固派，残酷地統治着人民，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之要結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打敗日本侵略者，就必須在我們党坚强的领导下，进行艰苦而复杂的斗争。

（二）党在湖北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而斗争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爭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經過我們党中央的一再努力，全国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終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宣告正式形成。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湖北地区各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也分別向国民党当局主动提出停止內战，共同抗日的談判建議。湘鄂贛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方針，首先发表了关于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宣言指出：

現在全面的抗日战争已在开展，最后的关头已迫近眉睫，中国須要和平合作，一致抗日，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抗战的彻底胜利，武装保卫华北，武装保卫沪杭，不讓日本强盜占中国一寸土，……实是爱国人民的道德与具体行动方針，……本党中央为和平努力，……以服从于当前最大的利益，認為中日矛盾为主要，阶级矛盾为次要，毅然决然转变政策，要求中国和平統一，一致抗日。……湘鄂贛省扼长江的中部，界三省的咽喉，控制于三条铁路之間，位置是何等重要！一旦呈现和平合作，的确巩固了抗敌的后方，增加了中国国防上的一部分力量。……我們的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集中全国人力、财力、武力，共同奔赴国难，以挽救民族危亡于万一。因此，絕不能同意这些破坏和平合作的与汉奸无耻分子，拿“招撫”、“收編”、“投誠”等的說法在群众中散布反宣傳，分裂民族統一战綫，或者是对抗战的迟疑与讓步和散布恐日病的思想，这种認識和傾向，显然是非常錯誤的。

为了迅速实现团结抗日，湘鄂赣省委积极地作了准备，并提出了两个谈判方案。

一个是合作方案，其条件是：（1）划湘鄂赣为特区；（2）释放所有政治犯；（3）发给经费；（4）红军改为抗日红军。另一个是停战方案，其条件是：（1）撤销对我们进攻的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2）把嘉义市让出来给我们，便于与武汉行营谈判；（3）我们集中部队通行无阻，不能逮捕和杀害我们的人；（4）发给经费；（5）停止诱降自首行为，叛徒来了我们就杀。

谈判方案确定后，湘鄂赣省委即着手进行了具体布置：

首先加强全党全军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经过十年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许多同志一下子很不容易接受与国民党合作……如说：“一致抗日，自然是好事情，我决不反对。但是，总不能和蒋介石这个卖国贼合作，十年内战，我们还认不清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吗？和他合作，这不是和狼一起睡觉，和虎一道走路吗？”战士们这种阶级仇恨，是血战十年锻炼出来的。我们召开各种会议，反复进行教育，战士们一经了解当前民族生死关头的抗日形势，懂得共产党要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从长远利益出发等道理之后，都一致拥护和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合作抗日政策。

其次，一边进行谈判，一边积极扩大红军，准备应战。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蒋介石一面与我们党中央谈合作抗日，一面下令要继续“清剿”湘鄂赣，国民党五十师就不断疯狂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强调提高警惕，积极动员老兵归队，动员群众参军，凡是在当地比较红的不能隐蔽的干部即调到红军中来，掌握部队，能隐蔽下去的干部，即布置坚持当地党的秘密工作，我们派罗相濤、孔怕凡同志打几百马刀武装部队；派吴咏湘、杨建新等同志率领便衣队，深入到湘阴、岳阳白区的湘江附近打土豪，搞经济，造成声势。各县委领导的游击小组，

积极活动。……发动群众，积蓄力量。

再次，我們发布了合作抗日宣言，到白区，游击区，城鎮附近、公路边張貼布告、标語，散发傳单，并发信給当地社会各民主人士，号召团結起来一致抗日；号召进攻我們的国民党軍隊，停止內战共同抗日，造成社会輿論，压迫敌人停战。

依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方針，湘鄂贛省委发布了合作抗日宣言，統一了內部思想，积极地整頓和充实了自己的力量，并有力地揭穿了反动派利用叛徒孔荷寵、方步舟等，企图以“招撫”、“收編”等阴谋手段来瓦解我紅軍的阴谋，这就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接受談判。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国民党派了两个連长到义江山口来与我們談判，省委書記傅秋濤断然拒絕說：“我們不同他們談判，要同武汉行营談判。”十八日，国民党五十师又派来了一个团副，武汉行营也派来两个參謀，省委就从机关和部队中选了一部分人，架起机枪在山上警戒，开始在义江山口的陈家大屋和他們談判，結果他們对于我們提出的四項合作条件認为吃不消。但也被迫接受了五項停战条件，第一次談判胜利了。

十九日，在嘉义市关帝庙进行了第二次談判，国民党的代表有五十师的一个旅长，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平江县的正副县长以及国民党平江县党部的書記长。湘鄂贛省委派傅秋濤、涂正坤、鐘期光等同志带着紅軍帽帶了駁壳枪去談判，并派梁金华、阮汉清等同志跟随警卫，又将紅軍布置在外綫警戒，以防万一。这次談判的結果，湘鄂贛省委和国民党代表达成了初步協議，沒有解决的問題，一致同意提交双方的上級解决。

七月廿二日，又在浏阳进行了談判，駐浏阳的五十师师长派人到湘鄂贛省委請求省委派人去談判。省委为了加强抗日宣傳，扩大影响，便由傅秋濤、吳永湘、何繼生等四位同志为代表去浏阳談判，四个同志都穿着紅軍服装，戴着紅軍帽到了浏

阳，老百姓见了非常高兴，都挤着来看。在浏阳谈了一个晚上，便谈妥了，规定了在浏阳建立省委的办事处，释放被捕的革命同志，以后不能逮捕我们的同志等问题。

八月下旬，湘鄂赣省委派黄耀南到武汉行营去谈判。董必武同志到武汉以后，谈判就由他负责。谈判成功后，傅秋涛同志秘密地到武汉会见了周恩来、叶挺、叶剑英等同志，研究了湘鄂赣部队改编的问题，最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四、五百名干部，三百九十多个战士，一共八、九百人就成了一支有力的抗日力量。

一九三七年五月鄂豫皖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的紅廿八軍，从西安八路軍办事处紅軍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处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共同抗日，国共谈判合作的指示。当时王稼祥同志还提出：

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敌人歼灭我们。谈判时，我们的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部队集合的地点，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要使干部认识到，谈判是为了团结抗日，绝不是向敌人投降。

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皖鄂边岳西县三区藍田村，我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主动向国民党提出进行国共合作谈判。根据鄂豫皖具体情况并提出以下条件：

(1)我軍在鄂豫皖的集合点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至礼山县宣化店一带的村鎮；(2)我軍在鄂豫皖三省共設三个办事处，分駐河南省确山县、湖北省黄安县和安徽省金寨县；(3)允許言論、出版、集会、結社自由；(4)釋放一切政治犯；(5)我軍的武器彈藥和給养要与国軍相同；(6)我軍开赴抗日前綫的交通工具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一律由国民政府負責；(7)我軍駐地如有土匪扰乱和違反社会秩序者有权予以鎮压；(8)我軍

进驻七里坪途中，友軍不得堵击追击，如发生冲突由国民政府負責；（9）我軍最后集合时间在年关以前；（10）我軍如有老弱殘廢者，返乡或探亲，友軍和当地政府应保障他們生命安全，如友軍認為可疑者，应送我軍办事处办理；（11）我軍家屬一律照抗日軍人家屬待遇，过去鄂豫皖三省被国民党强卖之妇女等愿回原夫原地者当地政府应协助，使之达到目的；（12）上述条款仅限鄂豫皖边区，凡屬全国范围的問題由两党中央决定。我部番号亦由两党中央确定。

这个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向我国内地侵略，鄂东与全国人民一样更进一步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抗日怒潮。国民党在人民压力之下，不得不表面上答应談判，但实际上仍多方面阻撓破坏。首先在岳西三区对我談判代表威胁誘降，阴谋未得逞，又以伪三十二师及保安团共十三个团兵力，将我駐藍田村的談判代表所率領的一百五、六十人，重重圍困，我軍一面坚持談判，一面坚决予以反击。最后国民党的阴谋失敗之后，加之人民的压力和我方的努力，不得不表示愿意正式談判，并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在岳西九河初步达成協議。

談判后，我方即执行協議，将在鄂皖边的紅廿八軍和公开的便衣向黃安七里坪集中，准备整編开赴抗日前綫。但是正在我軍向七里坪集中时，国民党却仍在千方百計地进行破坏，指派国民党一〇二师在麻城乘机进行阻擋挑衅。国民党这个阴谋失敗后，又以更恶毒的手段对我进行政治进攻，派其談判代表刘綱夫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委任状，来对我方领导人員进行“封官”誘降，把写着“鄂豫皖工农紅軍廿八軍整編为工农抗日联軍挺进司令部，特委任高敬亭为司令长官”的委任状送給我方，企图以此使我紅廿八軍与党中央分裂，为国民党所支配。对于国民党这种阴谋，我方談判代表立即坚决地予以拒絕。但是高敬亭却以做国民党的官为榮耀，独自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

状。

同年十月，党中央派郑位三同志为代表来领导鄂豫皖边工作，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指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我来时，党中央再三交待，不叫接受敌人的任何名义。于是坚决纠正了党内这种投降错误，而将国民党送来的委任状送了回去。

十一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谈判工作就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进行。

十二月，正式宣布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长江两岸的红军游击队，共组成新四军四个支队；鄂豫皖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四支队。

这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经过了一场尖锐而复杂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湖北地区宣告形成。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与巩固其根据地，我们抓住谈判合作后的有利时机，独立自主的进行扩军和宣传统一战线等工作，首先在七里坪红廿八军改编之后，即发动群众掀起了一个扩军与拥军高潮。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军人数就达二千多人，这时我军扩展为七个团。在鄂东南和其他地区，同样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 我们趁着机会扩大武装，我们原来只是有二百一十支枪，三百九十多人，三挺机关枪（有一挺是坏的）四、五百干部，一共八九百人，……到浏阳等地去扩大军队，扩大到一千一百人，到了慈化，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人。(2) 以公开的名义，收集部队，实际布置党的工作，派李辉到宜春慈化去布置，派罗普成到浏阳成立了通讯处，派谭启龙到平江成立了通讯处，派邱烦到通城成立通讯处，派李成侠到修水成立通讯处，实际上布置党的工作。(3) 为了自卫，打了七百三十个马刀，

我們天天起来練馬刀，这个时期，我們是这样搞的，同时我們利用何健下台和張治中上台的矛盾，搞錢搞衣服。

这里特別要提出的是：当时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央在武汉領導长江一带工作，正确地貫徹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既要搞統一战綫，但又要独立自主的建立党，建立武装，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这就为党在湖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战争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三） 湖北省委的成立。党組織的恢复和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前，湖北地区党的組織，在老苏区由于土地革命后期反动派一再“清剿”、摧殘，受到了极大的損失，也由于“左”傾路綫的錯誤，至使武汉市区党的組織遭到完全破坏。“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在武汉就发生了一些青年自发斗争，何斌同志在武汉組織了民先队、学联、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的組織。当时在“学联中的积极分子感到救亡的群众組織，需要一个起骨干作用的核心……但当时又无处找党的組織关系”。可見当时对党組織的建立已是群众的迫切要求。

一九三七年有个叛徒叫甘来坤，他叛变出獄后，在武汉团結了一批进步青年，建立了一个自发党支部，发展党员三十余人。其实当时他与党的組織并没有什么关系。

随后何偉同志由上海到武汉工作，把这个自发党接收过来，并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参加者有林先复，余梅青(后被洗刷)，楊学誠同志任書記。

楊学成同志(清华大学学生)是从延安参加了五月党代表會議后回北平，又随流亡学生經南京来武汉的。……在武汉工作委员会下面，有武大一个中心支部，一个学生小組，一个妇女工作的党团，还有几个零散的同志。……他們有一些工人与軍界有綫索，这些綫索正在建立关系，以前这几个組織很散漫，

沒有切实建立支部生活，沒有党內的教育。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实现，周恩来同志把錢英同志和陶鑄同志从監獄里保出来，十月中旬（一九三七年）南方局就派錢英、陶鑄和郭述申到湖北工作。我們到武汉后，見到了何偉同志，把他們的工作委员会和一个支部接收过来，建立了湖北工作委员会，郭述申同志任書記，錢英同志負責組織，陶鑄同志負責宣傳，并吸收了何偉同志参加了委员会的工作。

这时我們听董必武同志講（董老是中央派到长江一带作領導工作的）甘来坤是个叛徒，于是我們把这个自发組織进行詳細的审查，然后才个别的发展。这样經审查洗刷了十余个，只余党员謝文耀，魯明健，密加凡等二十余人。

湖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及經過审查整理組織之后，就为党在湖北的恢复和发展創造了新的可靠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湖北工委又遵照毛澤东同志指出的“大胆发展而又 不讓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正确建党原則，繼續发展和扩大党的組織。

我們首先在武汉大学建立了党的一个支部，又把学联公开合法化，又組織了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鋒队等青年群众性組織……同时在发动群众的斗争中发展党员，因而不到半年時間，在武汉的学校、工厂中建立了許多党的支部。

于是由于党組織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同时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工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临时省委。

省委組織亦于扩大会议上决定改組，新名单如下：

a、省委七人：李振寰（常委）、錢英（組織）、何偉（宣傳）、王亦清（工运）、方靜吉（农运）、楊学成（青运）、陶鑄（合作社党团）。候补二人：連士稿（青运部的积极的新同志）、黃致祥（工运部分的积极的新同志）。

b、常委五人：李振寰、錢英、何偉、王亦清、方靜吉。

此外，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也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抗日救国团体，如组织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统一战线乡村促进会，工人服务团等。

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湖北各县都有了党的组织，在武汉大搞群众运动。总之，从1937年9月至12月，是搞党和群众组织的建设工作，与组织建立的同时，我们就准备游击战争。这一时期看来（即长江局未建立以前，董老代表中央在武汉的工作）是贯彻了毛主席的指示的，群众组织，党的组织发展很快，也培养了许多干部。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临时省委扩大会议，省委人数增加到十一人。同时通过省委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工作大纲，其中关于组织部的工作有如下指示：

扩大和巩固武汉的组织，创立重要部门的新基础。发展工人党员三倍，调剂党员成份，加强党的基础，把党的组织中心移向几个重要产业部门，如兵工、邮政、铁道、海关、纱厂等。（2）建立和改造外县党的基础。改造鄂西旧有的组织……整理鄂中、鄂北、鄂东的关系，使这三个新建立区能切实地进行党的工作……等等。随之相继成立了武昌、汉口（即现汉阳）、汉口三区委。武昌区：区委本身在三月底成立，以五人组成之。党员总数及成份——共七十三人，工人二十五，店员十九，学生二十九。汉口区：区委——四月份成立，五人组成。党员总数六十一人，产业工人四十八、市民七、手工业三、学生三人。……省委工人部直接领导邮政四人，铁路二、印刷一，航政训练班党团四人，共十一人。宣传队共九人。军事方面共廿人。

由于省临时委员会注意党的组织发展……至五月底我们的统计，全省党员已有一千零四十人，在武汉共有三百六十六人。……此时武汉每一个工厂都有十人至廿余人的支部，在学校中亦有廿个学校单位，党员由流动趋于固定了。

今年六月（一九三八年）省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正式选举省委

十五人。……同时决定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每一区域都加派一些较强的干部。

湖北省委的正式成立和组织领导的进一步加强，就更加有力地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发展，更加有力地领导湖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首先是利用统一战线关系，开办了一个汤池训练班，当时训练班由国民党湖北省建设厅长李凡一名义开办，实际上是陶铸同志负责，通过这个训练班，培养了许多党的干部，有几百人毕业，以国民党合作社指导员的名义派到各县发展党的力量。其次，利用国民党党部组织的“巡回宣传队”，这个组织中有些是从上海、北京来的党员在里面工作，我们利用这个组织训练了干部，并通过这个组织使党的力量又发展到各个县去，这样，湖北各县都相继有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据点。

除了以合法形式发展党的组织外，而原来在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到一九三八年八月湖北党组织的情况是：

A、武汉：从徐州失守后，武汉形势非常紧急，最大部份的工厂及学校均纷纷向各地迁移或停开，因此除少数支部一部分的同志随工厂去四川或湖南以外，其余的同志有的回乡，有的参加军队或战地服务团或宣传队，有的到陕北受训，总计最近一个月来，从武汉转移外地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人。……从这一大的迁动以后，武汉有两个区委已经解散（武昌、硃口）目前只存在汉口区委……总计党员有二百五十人。

B、外县方面：

1. 鄂东特委所属有黄冈、圻水两县委和黄麻工作委员会，党员人数共有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另外黄陂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

2. 鄂南特委所属有大冶、阳新两县委、通城、咸宁、崇阳各区委、蒲圻特支，党员共计435人。

3. 鄂西中心县委工作范围十一个县，已成立的组织是宜昌

区委、荆沙区委及远安工作委员会，党员共计二百一十人。

4. 鄂北中心县委，领导枣阳县及光化、谷城、竹山、竹溪等特支，党员人数六月份报告已发展到一百七十人。

5. 鄂中特委领导下有应城、天门、京山、安陆、鍾祥、汉川、荆門等县均有組織，应城、京山、天门已成立区委，沔阳为县工作委员会，共计党员二百三十九人。

湖北省委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又遵照毛澤东同志的建党方针，进行思想建設。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省委通过的“一月十五至二月十五日工作大綱”中就明确规定：

加强党内教育，訓練旧干部，培养新干部，要求每支部小組經常討論政治問題，討論理論問題……进行思想斗争，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更有力地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除了各支部小組經常的教育外，省委还直接领导开办党员干部訓練班，这就是“黄安七里坪訓練班”、“湯池訓練班”及武汉的党员訓練班。

黄安七里坪訓練班，第一期的学员有二百多人，第二期就更多了，有四百多人，……坚持了八个月学习就轉到湯池訓練班，……湯池訓練班，当时实际上也講馬列主义，游击战争，党的建設。

同时，在武汉办的党员訓練班，从五月初（一九三八年）到八月底止共办了四期，第一期二五人，第二期二十八人，第三期四十六人，第四期三五人。而开办的四期党员短期訓練班中，每期分技术人员一班，支部書記和組长一班，积极党员一班，外县同志一班。

除省委直接领导开办訓練班外，其他各地党的組織也根据不同条件，举办了各种党员訓練班，当时的学习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中心内容，如学习“党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如“論新阶段”，“論持久战”等，此外还有“毛澤东傳”，“列宁傳略”

以及新华日报等理論書籍和刊物。

湖北党的組織在毛澤东同志正确的建党方針的指导下，不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了起来，而且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又注意了对黨員的教育和培养工作，这就为党在湖北領導抗日戰爭，締造了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的战斗堡垒。

（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从抗日戰爭爆发的那天起，湖北党的組織就坚决地貫徹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偉大号召，領導人民广泛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早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湖北地区就有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鋒队”等抗日团体出現，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入，抗日戰爭全面开展，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抗日救亡高潮。

南京淪陷前不久的时候，华北流亡同学会的活动分子楊学成、姜紀常、孙世实、陈一震、安天縱、黃德欽等同志，号召流亡青年督促当局发动救亡运动，并每天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要求到乡村去，組織群众，发动游击战争，經過三番四次的要求，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才允許他們組織“湖北乡村宣傳巡迴团。”……随着南京的淪陷，随着日寇进攻武汉的加紧，随着广大救亡青年的集中，……湖北豫南的救亡运动，象雨后春笋一般的在各地发展起来。姜紀常等同志領導的“青年救国团”，孙世实等同志領導的“民族解放先鋒队”，楊經曲、張执一等同志領導的“乡村教育促进会”及陶劍寒同志所領導的“鄂中农村工作社”等团体，先后建立。这些团体組織了很大的一批热心抗战的青年，在各地进行了許多实际的动员工作。（陈少敏：艰苦奋斗的三年）

为了加强抗日救亡团体的領導，并更广泛地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湖北党組織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壮大党組織的